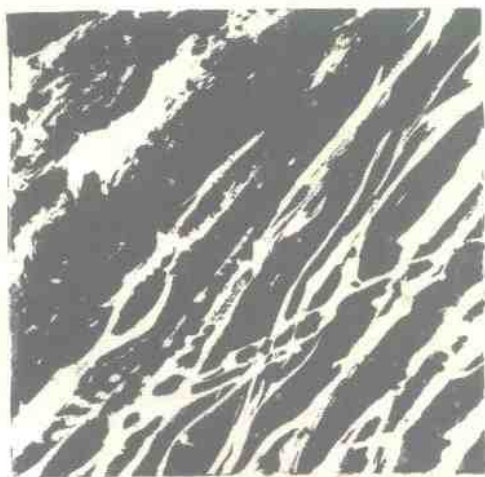




●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河北文史集粹

革命斗争卷



●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自“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中国革命斗争是一部雄浑悲壮的史诗；而河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则为这部史诗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本卷革命斗争卷。所选稿件主要是记述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性、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并以亲闻、亲见、亲历为特点，翔实、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河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些侧面。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李大钊与五峰山》一文，再现了李大钊躲开敌人追捕，在家乡传播马列主义的动人情景。郭隆真等人的传略，则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了河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五四”运动中英勇斗争的事迹。到20年代，中国即掀起了第一次工人罢工的高潮。胡华等人的回忆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河北铁路工人开展革命斗争的情景。30年代初，以农民为主体的红色风暴席卷燕赵大地。本卷收录了有关完县五里岗暴动、高蠡暴动、冀南暴动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河北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风貌。芦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逐步展开。1938年的冀东大暴动，奏响了河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序曲。李运昌、李楚离等人的回忆，向我们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河北以其当时特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著名的抗日敌后战场。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的广阔的河北大地上，到处都活跃着我抗

日军民的战斗雄姿——每一片青纱帐就是敌人的葬身坟墓，每一座山头都是一座可歌可泣的丰碑。本卷以较多的篇目反映了河北人民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

《冀中五一反扫荡》、《灵寿人民与陈庄歼灭战》、《百团大战回忆片断》、《挂云山六壮士》等文章，都真实地记述了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无比残忍和我抗日军民不畏强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扫荡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是胜利之本”，从中可以得到更深的体味。

有关抗日民众武装的文章，反映了8年抗战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也是燕赵儿女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一个缩影。

辑入本卷的几位抗日英烈，有著名国际主义战士，有投笔从戎的知名教授，也有童稚可掬的儿童团员。其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乃是长眠于这块土地上的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动写照。

三年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曾思玉等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示了这场伟大战争的某些侧面。《遵化万人担架团》等两篇文章，则反映了河北人民为推翻蒋家王朝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此外，本卷还辑录了一组中共地下斗争和公安战线方面的史料，此乃河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另一个具有神秘惊险特点的侧面。

几十年来，有关河北革命斗争的史料浩如烟海。本书以新的选材再现了这一斗争的画面，读后会给人以更深的教育和启迪。

编者

目 录

- 张垣、京绥铁路工人阶级斗争纪实 胡 华 (1)
-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始末 王士立 (19)
- 完县五里岗农民暴动 葛占龙 (30)
- 高蠡暴动 赵云山 贺宗善 (34)
- 冀南暴动亲历记 刘 栋 (41)
-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 李运昌 李楚离 (52)
- 忆保定二师学潮 宇 斧 (64)
- 河北大学的学潮斗争 朱 赤 (68)

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

..... 黄 桦 张硕忱 赵进元 韩守营 (81)

冀中蠡县地道斗争 王 夫 (92)

灵寿人民与陈庄歼灭战

..... 马介青 赵清玉 谢连玉 (102)

百团大战支前回忆片断 赵伯涛 (109)

黄土岭之战击毙日寇阿部规秀中将

..... 原河北省志编纂办公室整理 (113)

挂云山六壮士 唐喜书 (117)

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 田少辉 苏永志 (124)

孟庆山与河北游击军 赵云山 (130)

孙永勤与抗日民众军 朱程云 (138)

马本斋与回民支队 献县政协文史科 (148)

我所知道的渤海回民支队	张树金	(155)
回忆保定铁道游击队片断	张永顺	(168)
白洋淀雁翎队	彭守明 季章元	(174)
李大钊与五峰山	董宝瑞	(179)
回族女革命家郭隆真	郑一民	(184)
回忆白求恩大夫	江一真	(197)
白求恩遗体转移及修墓经过	宗健	(208)
忆包森将军	娄平	(214)
冀东抗联司令洪麟阁	陆占山	(222)
爱国志士杨十三	刘绍友	(228)
“抗日民族小英雄”王璞	丁殿民 赵建国	(232)
台湾籍八路军烈士李子秀	高存信 陈靖	(237)
朝鲜人刘汉平在中国的革命活动	苏淑斋	(240)
爱国华侨王守义事略	程一民	(246)
清风店之战亲历记	曾思玉	(251)
围攻保定	张振川	(257)
血战固城	费国柱	(263)
遵化县万人担架团	赵继峰	(269)
安国钢铁民工团 陈美健 牛国祯 梁学诚 康煜		(277)
抗战时期的石门情报站	张辰来 徐文英	(282)
瓦解侯如墉部队的一场斗争	王子兴	(289)
“八一三”特务组织始末 王银周 李克俭 张树林		(305)
回忆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电台案	杜济生	(314)

张垣、京绥铁路工人阶级斗争纪实

胡 华

序

张家口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胡华同志写的这份史料，是他访问了许多老工人、老的工运指导者和查考了许多文献资料而写成的。其中也包括了我经历过的一部分回忆。1921年秋，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因参加夺回里昂大学的斗争，被中、法反动派强行押送回国。次年在北京入党，并在陈为人同志领导下编辑《工人周刊》，参与了张家口的工人运动。1933年察绥抗日同盟军兴起时，我再次到张家口，并参与了工人运动。现在，我英勇的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我得以重来张家口从事工人运动，我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回忆20多年来的斗争，我们的同志流的血是太多了。胜利得来不易，我们缅怀往日艰苦的斗争，悼念流血死难的烈士，为的是更加珍惜我们今天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

1946年6月 肖 明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1月，以指导工人运动为宗旨由邓中夏主编的通俗小报《劳

《劳动音》创刊了。转年，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逐步开始在京汉、津浦、正太、京山和京绥线的铁路职工中，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人运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这个学校里，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革命学生向工人宣传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等理论，使马列主义在铁路沿线的工人中广泛传播。继《劳动音》之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介绍国内外劳动人民的情况、宣传组织工人运动为宗旨，由罗章龙主编了《工人周刊》（肖明与陈为人同志曾在该刊工作）。这一切在张家口的铁路工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工人已经风闻：苏联有个为工人解放谋利益的“穷党”；长辛店有个工人自己的“天国”——工人俱乐部（即工会）；国际上还有个工人自己的“五一”劳动节。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举行了千人大游行。于是，京绥路的工友们派了代表前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参观。有的工人看了或听了《劳动音》、《工人周刊》的宣传，知道了工人必须跟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做斗争才能求生存、得解放的道理。这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与京绥路工人接触。从此，京绥路的工人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1921年，中国铁路上存在着一种反动的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诒、叶恭绰为头目。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几乎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势力根深蒂固。国家铁路已经变为该系私产，他们贪得无厌地吮吸着工人的血汗。当时京绥路工人的薪水是极低的，小工一天2毛5分，一般工人5毛5分，工匠（即技术工人）也仅9毛，礼拜、病假、事假一律扣薪。在工人备受盘剥的情况下，京绥路局局长陈世华（交通系）任用私人300余名，每人月薪都在四五十元以上，多者达二三百元。而机车库主任王弼（交通系）为了随意任用私人，把司机、司炉的升进章程也取消了。京绥路工人忍无可忍，于是在

6月22日爆发了以司机、司炉工人为骨干的京绥路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志们的指导下，向反动铁路当局提出要求：一、增薪升进：工匠每年月薪增加3元，全日工每年日增1毛；徒工每年日增5分，4年升工匠；小工每年日增4分，4年升帮匠（此条实际至1925年才完全实行）。二、例假：每年病假、事假各2星期，每星期歇1天（在此之前没有星期例假制）。三、每年两次免票，以便工人婚丧嫁娶回家乘车，等等。同时列举陈局长罪状并请求罢免。罢工工人推举代表与交通部交涉，并下令京绥全线停车。交通总长张志潭闻讯后手忙脚乱，连忙派员调停。在罢工工人的团结斗争下，张志潭被迫答应给工人加薪等要求。

罢工从经济上取得了初步胜利，在政治上显示了工人的力量。工人们乘胜前进，成立了机务工人“精业研究所”（即工会）。这次罢工的胜利直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直系军阀及其卵翼下的交通系内阁。因而，这一经济斗争同时就带有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性质。同时，京绥路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由本来是没有组织、缺乏阶级觉悟的状态，迅速地走上了伟大的有组织的罢工运动，这也使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大吃一惊。这一胜利振奋了京绥路及沿线各地工人，并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了。党中央为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同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公开从事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长沙、汉口、济南、广州设立分部，李大钊任北京分部主任（1922年7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时，书记部主任由邓中夏担任，罗章龙任副主任）。在北京分部的领导下，京绥路工人运动更加深入了。

接踵而来的是张家口、南口2个大厂工人的反压迫斗争。火力集中在张家口车站高级员司（相当总务）荀锡龄与南口稽查毛

有德这两个铁路恶霸身上。这两人任意处罚、开除工人，强迫工人送礼，最为工人群众所痛恨。在共产党和书记部领导下，工人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齐奔厂长室，包围交通系杨毅（大厂的总负责人），提出：如不撤除苟、毛2人，工人就要“挂对”（行动的意思）！杨毅见势不佳，被迫答应。工人乘胜建立了工会（名为工业研究所）。1921年阴历9月，塞外寒风凛冽，在张家口忠厚里露天坪里举行全体工人大会，公推徐宝山为会长。

千百年来没有组织的劳动者，第一次挺起胸膛站立起来了，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和交通系便千方百计施展了破坏工人团结的权术阴谋：他们从机务段下手，一面以小恩小惠麻痹司机、司炉工人（如发给制服、金箍帽、皮鞋等）；一面收买“精业研究所”王守充、邢富瑶、张继海等3个工会中的不稳定分子（工贼的出现，使机务段被他们把持，成了整个运动的绊脚石，直到1925年才把他们在机务段的恶势力打垮）；同时，他们对一般工人也改变了口吻，过去一张嘴就骂“臭工匠”、“臭小工”等，现在也居然高唱起“劳动神圣”、“神圣劳动”、“做工得食”等欺骗口号来，在全路各地还建立了“职工学校”，企图拉拢一部分工人，培养些工贼走狗，以巩固他们在铁路中的反动统治势力。于是斗争日益趋向复杂化。

继机务、大厂工人之后，1922年10月，车务工人在张家口成立“车务工人同人会”，发展到全路，各站建立了分会支会，共举李连升为总会长。10月27日爆发了全路车务工人大罢工。

原来，京绥路号称国有铁道，是全国最赚钱的铁路之一。当时工人们计算：该路每月能盈利400万元，全路员工13000人，每月只开支30万元，只要一列火车从包头开到丰台，就足够一月工资开支。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这条路从宣统年间通车以来，却是一直就压支欠薪。

1922年4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直奉大战爆发，结果

奉系军阀的交通系内阁垮台，直系得胜。工人们在战祸中不但遭受差役、兵灾，而且当年工资直到10月份已整整8个月分文未发。隆冬来临，全路工人及家属老幼啼饥号寒，愁苦万状。在工人们支持下，工人同人会屡次派代表和局方交涉，局方竟不承认同人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对代表的要求置之不理。经反复交涉毫无结果，这就激起了全路工人的义愤。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同人会为改善生活待遇，为争取工会的合法权利，10月26日向当局提出要求11条，如不答应就实行罢工。

要求提出后，总段长直系军阀爪牙余炳仁，以威胁口吻扬言：“臭工人罢不了工！”并置之不理。消息传出后，各站车务工人气愤已极，乃于27日，全体工人1500余人一律罢工，全路停车。这次罢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何孟雄同志（工会秘书长）的指导下，事先有周密的布置，罢工中工人都有严密的组织。首先是大厂采取统一行动，罢工工人严格规定罢工纪律，互相监督，组织了敢死队、纠察队、宣传队，并且一齐出动。

反动铁路当局开始还假装镇静，但等到罢工坚持到第三日，就沉不住气了。于是，指使机务段工贼开出车头来破坏罢工。这一来悲壮动人的斗争场面就出现了：当车头飞快地开驶出来时，李连升同志领导的敢死队就光着身子躺在铁轨上，一个挨一个地有半里之长。红旗挥舞，喊声震天！在最危急的一瞬间，被迫在车头中开车的机务段工友采取了壮烈的自我牺牲的英勇行动，就势把大螺丝一拧，将风闸卸下了，轰隆一声，车头翻倒在一边。此时，工友们跳跃欢腾若狂。目睹当时情景的各界群众都禁不住流出了激动而同情的热泪。

局方闻报，恼羞成怒，决计实行武力镇压，派了武装警察200名，疾驰而来。警察到场，立刻被工人宣传队团团围住并四面喊话。在悲壮激昂的气氛中，警察们也被群情大义所感动，警察们说：“我们不得不过来，来了也不干涉你们！”察哈尔都统张锡元得

知后，无可奈何，又派了他的参谋长孟士魁和副官周某带兵1营包围车站，表面上说是和工人代表李连升等谈判，实际上是想乘机压服工人代表。罢工工人代表李连升等和三四百罢工工人却一齐拥进了士兵盘踞的车站。这1营士兵，一个个弹上膛，刀出鞘，包围得密密层层，只留一条小狭路，等把工人代表放进来，马上又合上了。交涉中，孟士魁大喝：“绑起他来！推出去枪毙。”我们的会长老李却哈哈大笑，全无惧色，据理力争。他说：“当工人的1个月不开支向人借，2个月不开支当卖东西，3个月不开支就没有办法了。何况8个月不开支！你们要枪毙，好吧，谢谢大人！枪毙了我们也和救了我们一样，省得挨饿受冻了……”因为工人团结坚定，斗争顽强，孟士魁终于答应调停。为防止局方变卦，工人同人会下令给敢死队：“敢死队40个人把车站两头把住，大伙轮流回家吃饭，一人一根木头棒子，把站台把得坚坚实实，谁来破坏，打死勿论，工友、警察一个样！”

该日晚，交通总长高恩洪不得不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完全胜利了，工人们于是全体复工。

在罢工中，通过与军阀进行悲壮激昂的搏斗，实际锻炼了每个工人。由于这次斗争的胜利，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大为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大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团结也加强了，京绥路的工人初步发动起来了，并逐步成为其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的一支坚强力量。

1924年初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北方，出现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开始转向革命。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倒戈，从前线回师北京，发生所谓“北京政变”。“二七”大屠杀的剑子手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二七”惨案后，趋于暂时消沉的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新的高涨，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形成了中国大革命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

势。

1925年初，国民军驻扎华北，中共北方区的《工人周刊》得以公开发行。何孟雄等同志受北方区委的派遣经常到张家口指导工作。京绥路工人的“工业研究所”、“同人会”两组织的活动逐步发展，声势日益浩大，拟于“二七”周年纪念日，建立统一的总工会。日帝走狗交通系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鉴于京汉路建立全路总工会时声势巨大的政治影响，便不让京绥路建立全路总工会。他们软硬兼施，搞了许多阴谋破坏：一方面通过局长孙连仲下令强迫解散工会；一方面利用“精业研究所”中的工贼王守充等3人，分化工人团结，收买一部分工人出头来反对成立统一的总工会。同时他们加强了为破坏工人运动而兴办的所谓“职工学校”的活动，在这所黄色工会式的学校里，成立什么自治会、游艺会、友谊会，喊出了“神圣劳动”，“为他主义”等虚伪的口号。另外，他们还唆使“职工学校”里的反动教员，在工人中以师生关系进行拉拢，并以行政提升为诱饵，分化破坏工人队伍。

工人们听到工会被下令解散的消息，正是“二七”大罢工2周年纪念的日子，同时，大家又接到了自己的报纸——新发行的一期《工人周刊》。在悲愤情绪中，依照《工人周刊》中的指示，在工作中避开工贼、高级员司的监视，分级举行小组纪念会。好多工会领袖对着“二七”伟大的殉难者——林祥谦同志的遗像宣誓：“学习林祥谦，不惜断头流血，誓为工人阶级解放奋斗到底！”

会后，工会决定，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一面派杨宗义（即杨干）等人到京津各地登报，动员舆论，并向冯玉祥将军请愿，要求恢复工会；一面即以“铲除工贼”的口号，发动工人同混在“精业研究所”中的工贼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中，终于把工贼王守充驱逐出“精业研究所”。工人们要给王贼照像登在《工人周刊》上，吓得他连连叩头求饶。同时，镇压了邢富瑶、张继海，争取了其他胁从分子。

“五一”国际劳动节，京绥全路统一的总工会终于在张家口正式隆重成立，选出杨宗义、李连升、王藻文（后来成为叛徒）等10余人执委，同时派遣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际太平洋第3次劳工大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的反帝大浪潮。6月初旬，这个浪潮很快地激荡到塞北的张垣。先是铁路总工会派出许多宣传员，向张垣各界进行宣传，并帮助工、农、商、学、蒙民建立团体。接着，各地群众因声援“五卅”运动被反动军警殴打死伤的消息不断传来，张垣的工人学生于是成群结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进行募捐，群众反帝反日情绪极其高涨。

6月10日，工人、学生、市民结队游行示威，近郊农民亦赶来参加，游行群众达三四千人。队列由宝善街南头铁路工会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境门前进。京绥铁路总工会巨幅大旗横书“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字样，游行行列中传单纷飞，旌旗蔽空，可谓盛况空前。队伍行至长寿街口日本领事馆门口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群情激愤，声震云霄，日本领事馆人员闭门不出。行至察哈尔都统衙门（即后来伪德王府）时，复遇日本领事馆人员，大家反帝情绪更为激昂，又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海陆军出中国！”“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等口号。游行示威群众至晚方散。事实上当时这些口号已是群众的行动方针。这次示威游行为以后历年的“抵制日货”等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和同盟军在张垣首先揭起北方的抗日义旗，实已播下了种子。

这时，电灯工人李振廷、陈儒仁，深受这个反帝洪涛的感动，又遇铁路宣传员宣传成立工会的好处，思想上受到教育和启发，遂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带动全体电灯工人50余人，成立工会，选举李振廷（1945年任市总工会副主任）、陈儒仁（1945年任电灯工会主任，市参议会副议长）、王金堂等7人为委员，不久即爆发

了轰动全市的反日增资斗争。

原来，张垣华北电灯公司自1917年（民国6年）成立起，日资即占一半，以后几年中，日资比重日益增大。公司一切几乎全由日寇幕后操纵（总经理何梅芳，是个著名的亲日分子，1934年竟拟将公司全部卖给日寇，后因地方各界反对未果。但所谓“中日合营”早已徒具名义）。

日寇对电灯公司工人的剥削极为惨重：不管学徒吃穿，每人每月工资5元，技术工人才10元上下，逼得工人们少吃缺穿；而每个工人一天至少装5个灯，每灯赚3元余，每人每天能为公司赚钱10几元。在反日情绪高涨下，首先解决摆在工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活和提高工人的地位，实是当务之急。所以经工人讨论，工会向中日资本家提出11条要求。

工会一面发出宣言，一面派李振廷、刘子香、王金堂3代表和经理郭雨田交涉。郭推交董事会，董事会借口公司赔钱，不答应条件。工人据理算帐，双方相持不下。此事轰动了张垣各界。最后，经张家口工人俱乐部俞和卿、铁路工会余大魁调解，除5%红利、每年给假1月、卫生费等项为保留条件外，余均答应。工人的基本要求与工会的活动权利已经获得，斗争遂告胜利。

电话公司工会由司机生30来人组成；在电灯工会斗争胜利的影响下，同样向公司提出4条要求：

（一）提高工资两倍，原为每人每月七八元，要求增至20元上下；（二）不在公司吃饭，由公司改发饭费，每人每月8元；（三）早起、夜班加点心、炒饭；（四）工作时间，顶班3小时，休息6小时（原只休息3小时，因司机生工作过度紧张，得不到充分休息）。

以上条件由工人代表赵文亮，向局方副经理靳墨林、稽查王智忱提出。靳、王不予答复，工会即决定当日晚6时实行罢工，停止通话。时值军事紧张，故未到罢工时间，局方即全部答应了工

会的要求。

“五卅”运动是中国大革命的急风骤雨的前奏，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等进步革命势力的影响下，国民军更进一步地倾向于国民革命。虽然国民军还不是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而是从军阀中分化出来倾向于革命的军队，然而，在国民军统治的张家口，革命运动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1925年下半年，全国革命浪潮澎湃发展。中共北方区派肖三等同志来张领导地方工运，加上铁路工会的影响与帮助，张家口各业工会亦继电灯、电话工会之后，纷纷建立。

在新建立的各业工会中，最大的是造币厂工会，有会员四五百人（该厂为1924年张锡元创立，制造铜元，地址即现华北机器厂所在地），工会委员为曹玉麟、陈自成、姜文林等人，当时工会领导力量较强。该厂工人多为天津人，国民军撤退后，该厂关闭，工会会员散布在天津，成为当时天津重工业工人的骨干。

其次是机械厂工会，有会员300余人，领导人为白景富等。该厂原随国民军来张，国民军撤退后，随军至绥、包、五原一带，对于组织所到各地的铁工、修械工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是邮务工会，有会员20来人。电灯工会在开展反日增资斗争时，向各地发送宣言，曾得到邮务工人很大帮助。

人力车工会则在张垣6个停车处，设立了“劳工休息所”，每所均供给茶水，间有文化娱乐。在国民军防守南口时，该工会曾挑选不少积极分子参加慰劳队，帮助前线运伤兵。国民军撤退时，很多人随军到绥、包一带，从事运输与情报工作。

其他马车、脚行、粮店、运输站，亦均酝酿成立工会；瓦、木、油漆、石、皮、毛、铁、银等八作，亦拟成立手工业工人工会，后因国民军撤退而未果。

此外，中共北方区还派遣乐天宇、李怀才等同志帮助指导张垣近郊农民运动，建立了大境门外与宁远堡的农民协会，发展及

于万全县。涌现了农民爱戴的农运领袖贾荣等同志。

与此同时，在宝善街南头建立了一个张家口工人俱乐部，徐宝山、杨宗义同志先后任主任，聘俞和卿同志为总干事。俱乐部里经常演出小型电影（多为苏联影片，如“高丽亡国惨状”等），亦演旧戏、话剧，并陈设许多新书，如《社会进化史》、《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等，报纸有《工人周刊》、《明灯》、《工人小报》等。冯玉祥每月拿钱1000元，支援俱乐部。俱乐部成了当时工人开会、学习、娱乐的最喜爱的场所。

当时，还从张家口选派了优秀工人和动员了一些察绥知识青年，到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的广州黄埔军校与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有郭保安（1929年后下落不详）、王建功（闻此人被傅作义部队羁押）和苏某、刘某（均失其名）等。他们在国民军退至包头后，对绥、包一带的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垣工运此时达到全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垣工人阶级已组织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自从1926年8月国民军退却，北方革命运动就趋向消沉状态。张作霖、吴佩孚会晤于北京，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奉系军阀重新占据张垣，反革命气焰嚣张。工会被取缔，各级工会干部被连续开除3批，共100多人。电灯公司、电话公司工人增资斗争胜利条款，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亲日资本家全部取消，一切恢复旧观，压迫工人变本加厉。张垣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多寿同志（蒙族青年）被捕入狱，受尽酷刑，至死不屈。审讯时，逼问口供，多寿同志一切由个人承当，不肯供出一人，遂被砍杀于清河桥畔，尸体由工人们掩理在西山坡的荒冢中。这是张家口为工人阶级事业第一个英勇的流血牺牲者。

在阴森残酷的环境中，铁路、电灯、电话等工会，仍然保持了他们的秘密组织。被开除失业的工友，有的利用在业工友的掩

护，进行地下活动；有的分散到铁路线两旁，从事农村工作；有的则转到平、津各地其它工厂，他们都保持了组织上的联系。当1927年4月，李大钊等同志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人偷偷地跑到东山坡野地里开会，沉痛地追悼自己的领袖——李大钊同志和一切蒙难的先烈。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北方工会组织普遍遭到破坏。张垣电灯公司被捕去工人领袖李振廷、陈百举、刘子香、李文会4人；电话公司捕去工会干部张修、王英、沈继昌、金某（失其名）等4人（他们坐狱50余天，适逢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遇赦出狱）；被公司开除的有赵文亮、陈菊如、张万金、董占元、苏乐昆等5人；京绥全路被开除而流浪失业者达200人之多。西直门的工会委员杨会恭同志、秘书长王尽臣同志，南口张珍、王廷芳同志，丰台的杨宝昆等同志，被捕入狱，于1927年冬1928年春，先后被反动派砍了头。他们都是工人中的最英勇的共产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在北方老军阀阎锡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新军阀，于1928年6月占据张垣。伴随着新军阀的统治，在张垣出现了军阀御用的官办黄色工会。

1928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和刘少奇、陈潭秋等同志领导下，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肖明、杨宗义两同志秘密来张，建立组织，恢复工作。于是，秘密的电灯工会，首先巧妙地借黄色工会的合法外衣恢复了起来。陈儒仁、李振廷、王金堂等人又公开出面，拥有会员四五十人。同时，利用国民党部收买工人的一些欺骗口号，向资方提出要求，恢复1925年订立的的劳资合同。

从1924年至1928年，张家口连遭5年旱涝，粮食歉收。晋军军阀、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主席杨爱源到张后，对张垣粮荒不仅不加救济，反而下手大批囤积，运往山西，致使张垣粮价更加